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

——高峰教授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影响

蒋雅文 孙寿涛 张彤玉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 高峰教授原籍天津市, 出生于湖北。1960年9月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高峰教授主张, 我们要反思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方法,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比较早地认识到,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特征, 向学界提出以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任务。他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提出创新性见解, 如在资本积累问题上他提出“制度-市场”二元的高峰假说; 在长波理论研究中, 他在确立长波内在机制的“技术-制度-市场”三元解释框架基础上, 明确指出第四次长波的下降阶段和第五次长波的存在, 并辩证预测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 理论和方法 高峰假说 长波

高峰教授1933年9月出生在武汉, 1951年参加工作, 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1960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至今。他曾于1984年和1991年作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分别在美国坦普尔大学经济系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系作研究工作。1988年至1991年他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 后来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室主任, 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高峰教授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选读等课程。¹

一、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

高峰教授很早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 少年时即自觉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事业。他从小就富有正义感, 追求光明, 追求进步。1946年至1950年底, 他在汉口郊区的教会学校博学中学(即现在的武汉第四中学)读书。期间, 他就对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受到曾经是新四军小战士的同学的影响, 他积极靠拢参加进步活动, 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1949年4月30日武汉解放(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解放后转为共青团员。1951年1月, 仅差半年高中毕业时, 他服从组织安排参加工作。最初他任职中共武汉市桥口区党委宣传部干事, 当时放手使用干部, 他参与领导了武汉市汉正街分段进行的民主改革(类似于农村的土地改革)。1953-1954年, 为了抓工业建设, 武汉市成立机械工业党委, 作为武汉市党委的派出机构。他被任命为机械工业党委宣传部干事, 长期在武昌造船厂蹲点, 参加该厂的建设工作。1954年, 机械工业党委撤销后, 他转

任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负责整个区的小学、卫生院和扫盲工作，工作很紧张。他积极投身共和国初创时期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工作中认真努力，勤奋任劳，在长达五年多的基层实际工作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改革开放初期，高峰教授就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成就与不足进行反思，倡导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991年，他的代表作《资本积累和现代资本主义》出版后，宋则行教授明确肯定道：“作者（即高峰）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三个主要方面的分析研究，……充分显示了作者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把现代资本主义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他的论著都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这种思路引领了学界研究倾向的转变，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股清流。

1. 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方法

高峰教授认同和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方法。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及、教学和研究方面确实取得很大成绩，需要我们坚持和发扬；但也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些亟待我们认真考虑和努力改进的严重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感不强，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现象缺乏解释力。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上，比较强调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为以后的学习打下牢固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学内容偏重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量较少。后来虽有所调整和改进，加强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但两部分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实际教学中大多还是分两个阶段来讲。学术研究上，多数人集中于对原著特别是《资本论》的注解，以及围绕原著有关内容在理解上不同所引发的一些争论，真正结合当代资本主义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则相对较少。

高峰教授主张，为在学术上避免陷入低水平重复，并避免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推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须重视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把教学与研究的基点放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上，并在传授基本原理时突出体现在原理中的基本方法，使学生掌握分析现实问题的科学武器。现代资本主义的许多重要经济现象需要我们去解释，如：物质生产领域和生产工人相对缩减条件下日益增长的商品价值和资本利润的源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纸币的本质、职能与经济作用；生产自动化和信息革命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垄断大公司的发展及其经济后果；生产社会化引起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重大变化；资本积累过程中若干基本变量的长期变动趋势；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特点与内在机制；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跨国公司的兴起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依存和矛盾；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等等。只有对这些重大实际问题给予科学解释，才能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命力、解释力，提高我们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自觉性。同时这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与改革，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更充分地认识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性，提高我们的经济调控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及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病，减少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和盲目性。

这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大大加强其现实感，提高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传统的两阶段写法，把垄断前部分和垄断部分打通，形成一个完整的更为科学而严谨的理论体系。他本人和他指导的学生围绕着这些重要的经济现象在这些专题研究上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涌现出系列重要成果。²

第二，理论原理主要局限于经典作家的著作，没有充分吸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在理论上的重要发展。高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都是紧密结合资本主义现实，大量吸收当时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写出的。但一百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断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广泛影响的著作。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谢尔曼的《经济周期》，鲍尔斯等的《荒漠国土的未来》等。这些著作及其他论著中包含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其中许多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未能进入我们的教科书和理论视野。至于西方学院派经济学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更是被当作异端邪说而拒之门外。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显得既单薄又脱离实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理论分析上偏重传统的逻辑推理，缺乏全面系统的实证资料，也很少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新的研究方法。高峰教授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沿用《资本论》的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也基本上未能超越马克思时代的水平，主要采用的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法，而现代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模型分析、计量分析、统计分析等则很少体现。这使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比在具体分析方法上显得很陈旧。《资本论》中的实证资料是极为丰富的，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实证资料却大多零散或过时，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统计分析，这也削弱了理论本身的现实感和说服力。

高峰教授认为，缺乏实证分析的经济理论，必定是苍白无力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考察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其运行机制，二是其发展趋势。前者具相对静态性质，后者具长期动态性质。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可相应分为运行规律和发展规律两类。这些经济规律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必然会通过各种经济现象得以表现，并可以通过实际经济资料加以证实。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律，会表现为若干基本经济变量的长期变动趋势，更需要用长期统计资料加以证明。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变化，一些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形式或强度也会发生变化，这也需要用长期统计资料加以检验。但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者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研究，客观原因是这类工作的难度较大，主观原因恐怕还是对实证分析的重视不足。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基本变量，如资本集中程度、实际的垄断程度、资本积累率、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剩余价值率、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生产能力利用率、实际的失业人口、一般利润率、不同阶级的收入差距、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对不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实际利润、对不发达国家的实际经济控制，等等，我们大多缺乏全面、系统而可信的长期统计数据。因此，必须加强统计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三个方面，反映我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学风和研究方法加以克服。高峰教授认为，只要我们树立正确的认识和指导思想，坚持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出发，重视长期统计资料分析，充分吸收国内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改进教学，我们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将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其科学性和生命力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2. 力倡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有益成果

高峰教授力倡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在肯定需要借鉴西方学院派经济学（主要是主流经济学）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建设、微观经济建设有用内容的同时；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国内学界影响甚嚣尘上之时，他更加强调要下大力气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他认为，及时追踪译介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果，可以作为解毒剂，帮助我们充分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很有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高峰教授多次指出，在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环境中，西方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和方法，很不容易。因为在西方的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会受到一定的压力，左派力量仅在少数大学有一定影响。他们在研究上的科学精神突出表现在，他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又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语句或结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经济学家的思想非常丰富，大量的经济理论探讨是经济学家做出来的，这些探讨应该写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探讨的问题本身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高峰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现实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对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力图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和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是一般市场经济所固有的问题和矛盾，其中不乏很有深度的成果。比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80年代中期就出版《宏观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研究，1990年他出版专著《经济周期》，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论述周期最深入的一本。另外，对长波，对劳动过程，对企业的内部关系特别是管理层和工人的关系等，国外都有大量著作，研究得很深入，这些东西对我们绝对是有重要意义的。除了对发达国家，他们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很深入的研究，比如说南北关系、发达和不发达的关系。其中不乏一些合理因素和正确结论，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因为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虽然其观点不一，但同样对我们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设计变量），对我们很有帮助。高峰教授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多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他们大都很优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学西方经济学觉得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现实，才转向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为严谨和科学，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经验分析，而且灵活地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中。有些学者如鲍

尔斯等，不仅对经济过程进行定量分析，还试图通过设计一些经济变量，对制度关系的变动进行定量分析。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我们国内的论文，议论、推论较多，但怎样用事实来证明则很缺乏。

在学术研究中，高峰教授提倡理性包容。即使是反驳性的文章，他也明确表示不能采取简单扣帽子或直接批驳的方式。搞大批判，是他一直反对的方式。他强调，哪怕真理在手，对于错误的观点也要采取从理论、学理上讲清，用经验资料证明的方法，力图以理服人、用证据服人、用比较服人的办法。他多次强调，中国的理论界应形成更宽松的学术环境，打破禁锢，更加解放思想，切实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并未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科学论断去推动学术探讨和学术研究。他尤其强调，我们要摒弃过去那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心态，不要总以为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非正统的，对他们的著作一概采取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实际上，许多西方左派经济学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方法，进行着严肃的科学研究。他们联系实际紧密，思想束缚较少，理论思路开阔，观点可能有对有错，但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要比我们深入得多。我们也应抛弃过去那种对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盲目排斥的态度。现代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已经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论著浩瀚，学派林立，大多数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对策性。因此，对西方学院派经济学也要认真研究，吸收其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借鉴其丰富的实证资料。比如在对垄断竞争理论的研究中，他就主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批判性吸收“资产阶级学院派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的研究”³。显见，他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进行研究的。⁴

二、学术新见和学术影响

高峰教授很早就确立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出发，重视长期统计资料分析，吸收国内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峰，1991，作者的话）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作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着深远的学术影响。他曾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学术奖励。退休后，他仍笔耕不辍，新作迭出，并于2012年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和“特别贡献奖”。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既是高峰教授早年一本专著的书名，也是他一生学术努力的主题。他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特征，但它与西方学院派（特别是其主流派）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在出发点、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均有根本区别（高峰，1991，P8）。所以他较早地向学界提出以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任务（高峰，1991，结束语）。他本人持续不懈地为完成这一目标而努力着，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提出创新性见解。限于篇幅，我们仅介绍他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学术新见，一是资本积累问题上的制度-市场二元假说；二是对长波理论研究的推进。

1. 资本积累理论的“制度-市场二元假说”

高峰教授在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上，既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内容（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的科学把握，又有结合现代资本主义实际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他坚持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与演变，提出“制度-市场”二元假说作为资本积累过程演变的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从思想史看，这一“制度-市场”二元假说可以命名为“高峰假说”，可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创新。

所谓制度和市场二元假说，意指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即制度问题和市场问题。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演变的直接推动力。任何长时期的资本积累缓慢与停滞，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问题和市场问题空前尖锐化的时期；而长时期的资本迅速积累，则必须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大规模开拓作为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就是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这一解释框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体化了：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既要求通过制度变革来突破制度约束，又要求通过扩大市场来摆脱市场约束；而制度变革和市场开拓则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矛盾运动的反复中，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演变。因此，与资本主义经济演变同时发生的世界市场的周期性扩大，不应简单视作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单纯归因为某些偶然性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变革推动的，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来说是内生的。

这一假说为资本积累机制的解释搭建了一个更为科学而全面的框架，与现有的两种重要的西方左派理论均有所不同。“垄断资本学派”（Monopoly Capital School）在正确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垄断特征的同时，从资本生产的剩余不断增长而剩余吸收日益困难这个中心命题出发，把市场和实现问题提到首位；但它完全忽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作用，而把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后期以来的几次长期迅速发展单纯归因于“划时代的发明”和“战争及其后果”等所谓“外部刺激”。这种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SA School）则正确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演变在萧条长波和扩张长波更替中的作用；但它没有把实现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没有突出世界市场的结构性扩大是资本主义扩张长波的先决条件。这是其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制度-市场”命题则弥合这两个学派的不足，对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提出一个更完全的理论解释。

高峰教授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与演变的研究，更体现在他对长波现象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在他2018年的最新作品《论长波》中，他进一步提出“技术-制度-市场”三元框架，来解释长波的内在机制。

2. 长波问题上的“新见”

高峰教授长期关注长波（或称长周期）现象和长波理论，通过他的教学和研究将长波理论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在他的引领下，这一领域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⁵他在长波问题上的新见，既表现在解释框架上，也表现在对具体的第四次和第五次长波的特征分析上。

(1) 确立长波内在机制的“技术-制度-市场”三元解释框架

由康德拉捷耶夫开创的长波理论，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内，但却是非正统经济学家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尽管仍有怀疑论者，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资本主义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与古典经济周期不同的长达50年左右的长期经济波动，包括20多年经济迅速增长的长波上升阶段和20多年经济相对停滞的长波下降阶段。长波的上升和下降阶段，分别包含着两到三个连续的古典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快速增长和下降阶段的低速增长，是分别作为若干个温和的周期或若干个剧烈的周期的连续运动而表现出来的。长期波动与周期波动虽然有这样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在经济运行中，由于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的影响，劳动份额、能力利用率和原材料相对价格的规律性变化所引导的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即可导致投资的上升与下降和生产的扩张与收缩。

思想史上，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释形成三种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一是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主要强调一定时期重大技术创新群集的出现所带动的投资高涨，以及技术革命潜力用尽后所导致的投资衰落，是推动经济发生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二是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认为由若干基本经济变量所制约的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同时他强调促使经济转入长波下降阶段的经济因素是内生的，但经济转入长波上升阶段必须依赖外生因素的推动。三是“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长波理论，强调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特定制度环境(即社会积累结构，SSA)的形成和衰败在经济长期波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特定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和衰败都是内生的经济过程，与不同社会积累结构的更替相伴随的是相继的长波，并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个学派也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

高峰教授认为，三种长波理论所着眼的重点显然不同：技术创新理论强调技术变量，曼德尔的理论强调以利润率为中心的经济变量，“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强调制度变量。在他看来，这三种不同解释，与其说互相对立，不如说互相补充。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是投资，投资率和积累率的高低是制约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长波上升阶段迅速的经济增长总是和较高的投资水平相联系，长波下降时期缓慢的经济增长则通常是投资水平低下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已被无数实证分析所证明。因此，应把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依此不难看出，上述三类变量均与投资率的长期变化直接相关。具体言之，长波上升时期较高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形成至少需要四个条件：一是来自上升的利润率和由此而产生的乐观的利润预期所形成的强大的投资动力。二是旺盛的投资需求，这来自技术革命和创新群集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以及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传统生产部门深刻的技术改造。三是有利的投资环境即特定制度条件，这意味着制度结构的某些重大变化，这是任何长时期的投资高涨所必需的。第四，投资的市场需求。较高的积累率要求国内外市场扩大，以满足巨额投资所生产的大量产品的实现条件。这些产品如果不能被市场消化而实现其价值，资本家就不能获得利润并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上述三种理论对这一点虽有涉及但并未突出强调。反过来看，长波下降阶段较低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则是由于投资动力、投资的物质基础、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及市场需求这四个基本条件的缺乏。因此，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经济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多种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我们可以以积累率为中心，围绕“技术-制度-市场”三个方面来观察长波的基本特征。显然，这一框架更为科学而全面，有其独特的理论优势。

依据“技术-市场-制度”三元框架，高峰教授着重对第四次长波的下降阶段和之后五次长波展开研究，新见迭出。

(2) 明确第四次长波的下降阶段和第五次长波的存在

思想史上，对二战后50到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第四次长波上升阶段，绝大多数长波学者几无争议，但对此后的发展则观点不一。许多学者认为，从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的长波下降阶段，直到20世纪末，并延续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基于技术-制度-市场三元框架和严格的实证分析，高峰教授认为，在50-60年代的经济繁荣（即第四次长波的上升阶段）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并非处于持续的下降趋势，而是经历了一个新的长期波动。经过1973到1982年大约10年的增长率减速（第四次长波的下降阶段），从80年代早期开始了新的增长加速时期，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重新加速，应看作是进入了一次新的长波上升阶段（即第五次长波的上升阶段）。正是8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技术）、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制度调整（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市场），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次重大结构转换，使之进入新的长波上升阶段⁶。2008年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形成此次长波的转折点，开启了长波的下降阶段。这种转折的必然性在于有利于扩张长波的各种因素逐渐向不利于积累的方向转化。正是此次扩张长波及其特征，决定了2008-2009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非一次单纯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或一般的金融危机，而是一次形成长波转折点、开启萧条长波阶段的结构性大危机。一些西方左派学者将其称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而与单纯周期性的衰退或危机相区别。

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在这场“大衰退”结束后，并未出现通常的周期性高涨，而是进入一个相对停滞时期，即“长期萧条”，充分说明这场“大衰退”确是一个转折点，开启了此次经济长波的下行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由“大衰退”开启的长波下行阶段，已被许多学者称为“长期萧条”，其形成并非偶然。它同样是扩张长波时期所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从技术基础的结构性矛盾来看，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已逐渐消退，而新的技术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整个社会缺乏带动生产率和投资迅速增长的技术动力。从制度基础的结构性矛盾来看，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对资本积累的主要积极作用已转化为消极作用，而新的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结构还未生成，无法解决目前积累过程中不断加剧的深层矛盾，促进利润率全面回升，以带动投资和经济迅速增长。从市场基础的结构性矛盾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开拓效应已转化为更严重的全球生产过剩，而新的全球市场扩张又面临强大的政治、社会阻力，无法解决当前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不能为积累和经济更快增长提供市场条件。

(3) 辩证预测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趋势

高峰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要走出“长期萧条”、开始新的扩张长波，就要看上述三个基础性的结构矛盾得以解决的时间和程度，真正实现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与转换。资本主义经济从2007年开始爆发金融经济危机至今已有10年，从2009年下半年走出危机进入复苏阶段也已8年，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解决得仍不理想。从技术基础、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来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复苏阶段8年后，仍未出现显著的调整与转换，形成走出“长期萧条”的基本条件。

他预测道，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结构性矛盾的缓慢调整观察，此次萧条长波可

能还要延续一个时期，具体年份难以预测。当然不论时间长短，资本主义经济也不会永远处于衰退或萧条状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高潮兴起，对资本积累相对有利的制度结构逐渐形成，以及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长波上升时期终将到来。技术基础方面，工业革命的逐渐发展是肯定的，但制度结构的调整目前看来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迅速壮大，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在逐渐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国外市场。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展，有可能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入一次新的扩张长波提供有利的市场条件。

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经济周期和长期波动中发展和演变的。预料资本主义当前的萧条长波终将转化为新的扩张长波并非断定资本主义将在长期波动中永世长存。其实，从近几十年全球经济政治的实际演进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趋势。高峰教授辩证地强调，我们应该把趋势和波动区别开来，趋势是体现在波动过程之中的。即使是在1983-2007年的长波上升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在相对趋于衰落。同战后“黄金时代”经济社会稳定繁荣相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可同日而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兴起，世界经济形势进入21世纪后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经济体系从“中心—外围”的两极格局，正在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元格局。有些学者否认这种变化，那是闭眼不看现实。美国带领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时代可能将一去不返。而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中，高峰教授一如既往地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结语

高峰教授多次坦承，虽已离休，已年届86，但他从没有老人心态。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会继续其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秉承着始终一贯的指导思想，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方法，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出发，认真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益成果，重视长期统计资料分析和经验证明，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致力于资本积累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并以其系统的著述和创新性见解，达成了其早年树立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峰教授主要著述目录：

主要论文

高峰等，1978，《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合写），《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高峰等，1978，《经济军事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合写），《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3、4期

高峰，1979，《谈谈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争论的关键》，《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高峰，1983A，《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现代美国的失业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高峰，1983B，《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高峰, 1989, 《从战后欧洲的经济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 《南开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

高峰, 1991,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

高峰, 1992, 《集中和垄断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3期。

高峰, 1996, 《垄断资本论纲》, 《当代经济研究》, 1996年第5期。

高峰, 1999, 《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若干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

高峰, 2000,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高峰, 2001, 《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几点看法》, 《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高峰, 2002A, 《生产劳动, 价值总量与劳动价值论》, 《南开学报》2002年第1期。

高峰, 2002B, 《“新经济”, 还是新的“经济长波”?》, 《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

高峰, 2003A, 《论财富》,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第2期。

高峰, 2003B, 《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 《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高峰, 2004, 《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 《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高峰, 2005,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质和二元路径》, 《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高峰, 2006, 《发达国家“后工业化”一定时期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之谜》, 《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高峰, 2009,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

高峰, 2010, 《关于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几点看法》, 《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2期。

高峰, 2011, 《全球化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 《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高峰, 2012A, 《论生产方式》,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高峰, 2012B, 《关于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几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高峰, 2014,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第2版),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高峰, 2018, 《论长波》,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9期。

主要著作:

《商品的秘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评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合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0 年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垄断资本概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历史与当代》(合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研究》(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中国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高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合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教材：

-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

注：

作者简介：蒋雅文，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张彤玉，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主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三人均是高峰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¹ 鉴于刘凤义曾撰文对高峰教授的主要学术成果（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垄断资本理论、当代资本积累的若干问题、虚拟资本的性质、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和企业并购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刘凤义，2008）。刘志阳曾基于自身经历撰文对高峰教授的治学风格、学者风范和高洁人品进行介绍（刘志阳，2013）。为免重复，这里我们主要从指导思想（即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和学术新见（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两个方面介绍高峰教授的学术贡献。

² 高峰教授主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运行特征》一书，就是这些成果的呈现之一。

³ 张雪琴：《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3 期。

⁴ 通过其扎实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活动，引领学术倾向转变外，高峰教授还引领和开创新的研究领域，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至少有两个研究领域和他的倡导分不开，一是长波理论研究；二是劳动过程研究。对前者的介绍见本文第三部分，限于篇幅，后者我们从略。

⁵ 通过其扎实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活动，高峰教授引领和开创新的研究领域，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至少有两个研究领域是和他的倡导和引领分不开的，一是长波理论研究；二是劳动过程研究。限于篇幅，对于后者我们从略。

⁶ 高峰教授也坦承，他在 2002 年的论文《“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中提出美国进入新的扩张长波，但当时认为此次长波始于 90 年代，从而以为扩张长波还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来源：南开学报 2019 年第 5 期